

打禾机

黄孝纪

就像许多消失的乡村旧器物一样，在我的故乡八公分村，“双抢”这个曾充满了酷热、汗水、辛劳、忙碌、收获、希望、金黄、浅绿等丰富意象的专用名词，也早在十几年前就遗弃在时光深处，成了陈迹斑斑的历史。

算来，村庄的稻田从种植一季到两季，再又回复到一季，甚至全然抛荒，其间也不过三十来年的事情，也就一代人而立而已，真可谓沧海桑田。旧时的“双抢”一词，也就是这段农业黄金期的产物。

所谓“双抢”，就是在早稻收割的时候，还得紧接着备耕和插下晚稻的秧苗。正逢盛夏酷暑，时间紧迫，耽搁了节气，纵然晚稻插下田，也是秋收无望，或结不了穗，或结的穗短秕谷多，算是白忙活了。正因为如此，在这十几二十天之内，村人一家老小，从天亮到天黑，无不在田野间忙碌，抢收，抢播。即便远在城市务工的人，也得赶紧回家，跟节气赛跑，抢日子。这是一年中最繁忙劳累的乡村时光。

打禾又是“双抢”中最辛苦的力气活。

分到户的最初几年，我尚在上中学。每年“双抢”恰好是在暑假，全程参与劳动也就义不容辞。那时，父亲已是年过七旬的老人，母亲也五十多岁，抬打禾机、打禾、挑稻谷回家这类重体力活，就全靠二姐、三姐和我。我们姐弟三人，年龄依次相差三岁，身材都较矮小，力气也并不十分大。

打禾机是几户人家共用的。生产队解体的时候，耕牛、犁耙、打禾机这几样大的生产资料，平均分成几个小组，每组由五六户人家构成，共同使用。每户人家的稻田，好、次、劣搭配着，往往有四五处，分散在村前的不同地方，村人称作“杂花田”，最远的两丘田之间，有一两里路。如此，一到“双抢”，那一台打禾机就很紧缺抢手。通常的办法，一是排班轮流着用；再就是见缝插针，当一家打完了一丘田的禾，而另一家刚好割完了一丘，就赶紧来抬了去。在“双抢”的收割期，打禾机就这样每天来来回回，被人抬着在田野间穿梭。

这些老式的打禾机很重，在生产队的时候，打禾的人都是年轻力壮的成年人。分到户后就不一样了，得全靠自己一家的力量。家中有青壮年男子的，抬打禾机、打禾、挑谷这类重活都不成问题。家里劳动力弱，比如我家，做这些事就尤为辛苦了。

打禾机是装配式半机械化的大型农具，可拆卸成三大部件：其一是

打禾机方桶，杉木制成，长方体，前端挡板高出许多。桶底两侧各一根通长的粗大木枋，是整个打禾机的最终承载受力构件，并一直前伸超过方桶三四尺许，上面钉四五条横木枋，形成打禾时站脚的平台。方桶前端两侧装有圆盘状的漆黑齿轮，通过扁条钢铁连杆，与站脚平台上一根单独的横枋（也叫踩板）相连，组成能升降的踩踏系统；第二个重要部件是滚子，两端是有均匀开孔的铸铁盘，其间由手臂宽的长枞树板条（枞树板比杉木板重，能增加滚子的重量，利于滚子的旋转惯性）连接，板条上密集钉上尖拱形的粗铁丝，整个儿看就活像一只圆筒刺猬。滚子中心，横贯一根圆钢轴，轴端有拧旋的漏斗状铸铁耳，用时抬放进方桶，卡在齿轮处，拧紧后，即可驱动踩板，带动滚子顺时针飞速转动；其三是五块大小形状不一的杉木板，最大的两块大致呈梯形的多边形板，安装在方桶中前部两侧，其余三块镶嵌在两块侧板的后面和上部，共同维护着方桶里的滚子，打禾的时候避免谷粒飞溅出来。装配好的打禾机，在稻田里如同一间木屋，前拖后推，能让其移动。

将打禾机弄到已经割倒稻禾的水田，不是一件轻易事。通常我们三姐弟各有分工，三姐用一担谷箩，一头挑滚子，一头挑木板，我和二姐抬方桶。早稻收割时不同于晚稻，为便于翻耕，田水并不溜干。尤其是水浸田，泥深水深，从这样的稻田里将泥水浸泡透的打禾机拖到田埂边，拆卸后再抬到另一丘远田，就更费力。每一次，二姐都是抬前面，我抬后面。方桶覆过来，底板朝天，她先托起桶后，我蹲着，将头伸进桶内，桶壁压在我两肩，双臂伸开，从外面攀住桶侧的拖耳。待我用尽全力，弓着身子略为站立，她这才走到前面半蹲着，用肩膀抬起站脚平台。方桶前重后轻，两人抬起来后，整个重量大多由二姐承受。

抬打禾机，全靠二姐在前面带好路。我们都是赤脚，田埂弯曲而仄，石板路和砂石路又咯脚，若不注意，还会栽倒或踢破脚趾。桶板压进我肩膀的肉里，直抵骨头，痛如刀割。我头总是勾着，只能俯视脚下不断前移的地面，泥土、青草、石块、砂子、水圳、沟坎……不停地变换，外面的一切全然不见，只能跌跌撞撞地跟着走，浑身痛得龇牙咧嘴，根本就不知道走到了哪里，只盼望着快点达到，释下重负。

在稻田里重新装配好打禾机，一

家人各司其职。我们三姐弟打禾，父亲在方桶后面撮谷。母亲则大多数时间要留在家中弄茶、弄饭、煮粥、扫禾场、晒谷。用手推动滚子旋转几圈，踩板随连杆上升，踏上脚板猛踩，滚子顿时疾速转动，发出巨大而急促的嗡嗡声。打禾也就开始了。

用“你追我赶”一词来形容我们姐弟打禾的状态，一点都不为过。打禾机一旦发动，就不让它停下来了。烈日下，我们有时连草帽也不戴，双手掐住一大把割躺在田里摆放好的稻禾根部，俯身一立，便急匆匆大步往回赶，左脚踏上打禾机站脚平台，右脚随即踏上踩板，用力蹬踩，打禾机发出的声音立马高亢了起来。平台上只能同时容纳两人，各站一端。脚一边踩，双手掐着稻禾左右转动，以便让稻穗都能被飞速旋转的滚子击打到。谷粒如雨点般喷溅，打得木板哗哗啪啪直响，有的甚至能飞出来，射在我们的脸色，痛！

父亲在打禾机桶的后面也十分辛苦。他身边同时放了几只谷箩，一直俯首弓背站着，双手伸进方桶里，不停地扒拉梳理那些被滚子旋下来的稻秆、碎叶、稻穗，村人叫毛丫。毛丫捧出来，放进较旧的谷箩里。再将稻谷用撮箕撮出来，倒入全新或半新的谷箩。在我们打禾的时候，他便总是保持这种姿态，很少有立身挺直的机会。他背上退了色的旧蓝布衣服汗得透湿，在太阳下烤出一圈圈西瓜纹的盐霜。他的脸和手，还要忍受谷粒和毛丫的溅射和撕割，划痕密布。

打禾总是先打近处的，而后渐渐散开，形成一个大的扇面。当往返的距离较远时，便需将打禾机前移一程。打禾机方桶的四角，向外各伸着一块巴掌大的木板，叫桶耳，前面两人双手提托起来，前拖，后面的人则用力推着。于是，在稻田软泥上，就会留下两条如同铁轨的光滑深痕。

酷暑里打禾，大汗淋漓，对茶水的需求大。铜壶里带来的凉茶，很快就会你咕嘟一杯我咕嘟一杯喝干。许多时候，我会提着空铜壶，就近到江岸的泉眼或水井去打一壶水来。趁着这个间隙，我在水里洗一把脸，泡一泡手脚，畅快多了。父亲和姐姐则继续在稻田里忙碌。

谷箩里金黄的稻谷一一满了，我们姐弟就要挑着送回家，倒在禾场上供母亲晾晒。父亲此时方可坐在田埂上歇歇，卷着草帽边扇扇风，吸一筒喇叭纸烟。

此时，晴热的天空下，打禾机也暂且沉默着。它伏在泥水里，仿佛也在静静地恢复元气，等待着下一轮高亢而激烈的搏击。

感到高兴。这或许是因为妈妈就像石灰一样，不怕艰难、坚守清白，在生活艰苦的磨练中，累积得到的智慧。

看着沸腾的石灰，我渐渐品出了人生的味道：世上没有不弯的路，人生成长的路上也就不可能顺风顺水。其实，面对别人泼“冷水”，何尝不是件好事！关键是要有面对“冷水”的勇气，不怕跌脸面。也许，“冷水”过后，会让你神清气爽，会让你更加沉着冷静、意志更加坚强。真正的“冷水”，就是我们人生成长中的缺点，正因为有了那些诚心诚意泼“冷水”的人，才让我们重新积蓄力量燃烧，才让我们人生的路上越走越精彩，如同眼前的石灰，别人越泼冷水越沸腾！

红薯叶项链

詹慧群

昨日，一文友在乡土人文读书沙龙里发了相片，是用红薯叶做的一根“全球限量版”项链。一时间，如同一枚小石子投进心湖，让原本水平如镜的湖面荡起了微澜，也勾起了我儿时的记忆。

用老妈的话来说，红薯命贱。有句时髦的话是“给点阳光就灿烂”。对红薯来说，有点泥巴就安家，不管是肥沃的黑泥巴，还是贫瘠的黄泥巴、红泥巴，甚至是如老家那紫色页岩风化而成的晴天像把刀、雨天一团糟的粗砂粒。那时村里家家户户都种了红薯，田里地里山坡上，到处都有，到处都是。

大约是惊蛰前后，在洞里冬眠的青蛙用它那瓮声瓮气的嗓门儿发出一阵阵闷叫。大人们摸出一把老得掉牙的钥匙，郑重地打开挂在地窖上那把锈迹斑斑的铁锁，把上一年收检的红薯种拿出来。在山坡上朝阳的地方翻地、松土、挖坑，泼上腐熟的人畜粪尿，种下一个个细细剔过的红薯种。

几场春雨后，红色的红薯幼苗拱出弯弯曲曲的小身子，探头探脑，很小心地打量着这个新奇的世界。再过三五日，那些红色的幼苗渐渐返了青，在春日的阳光雨露中伸枝展叶。像长蛇一样爬满地的红薯藤蔓，藤蔓上长着翠绿的叶子，那些叶子有着长长的叶柄，叶柄高高地将叶子举起来，像撑着一把把小绿伞，将地面遮得严严实实。

谷雨前后，待红薯藤蔓长得繁盛，便开始了红薯栽培的农活。拿一把镰刀，把粗壮的红薯藤蔓从地里割回来，一家人围坐在红薯藤蔓旁边，用剪刀剪红薯藤作种苗。

一根红薯藤蔓，可以剪出近十根红薯种苗。红薯种苗剪好以后，剪剩下的红薯叶子，也不舍得浪费，村里人喜欢拿来做菜。按照老家的做法，要去掉叶子，撕掉叶柄上的皮。撕红薯叶柄的皮是个细致活儿——红薯叶柄的一侧有一道细细浅浅的槽，撕皮的时候，需从有槽的一面撕开。红薯叶柄的皮很有韧性，一般不容易折断。但人的智慧真的是无穷的，尤其是千百次劳动造就的如我母亲一样的劳动人民。她用指肚从红薯叶柄有槽的背面一顶槽中间，先挤开个口子，再抓住叶子，顺着开口往下一撕到底，整个叶柄的皮就被完整撕下了。我们学着她的样子，现炒现卖。但更多时候是半道滑脱，或者只撕下一小段皮。这样的话，还得把叶柄再折成小段，一点一点把皮撕干净。小孩子没有耐力，偶然撕到一根完整的就免不了大肆炫耀一番，撕坏了就自顾自地做起红薯叶项链来。做红薯叶项链和撕皮差不多是一样的程序，只不过更需要小心翼翼——不能一撕到底，只能一小节一小节撕下约略半厘米长的一段，再从有槽的背面撕下半厘米长一段，正面一下、背面一下、正面一下、背面一下，如此反复，步步小心，一不留神断了线，就再也连不起来。红薯叶柄被折成许多的小段，那些小段由两边撕出的皮连着，像一条被串起来的绿色项链，那翠绿的心形叶子，便是项链的吊坠了。一串做成功了，便会再接再厉、一鼓作气做出好多串，脖子上挂一串，左右耳朵上一边挂一串，手上还拿着一串，小伙伴们相互比较，相互显摆。

半个多世纪以前，大文豪鲁迅先生在《在仙台》一文中写道：“大概是物以希为贵罢。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，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，倒挂在水果店头，尊为‘胶菜’；福建野生着的芦荟，一到北京就请进温室，且美其名曰‘龙舌兰’。”小时候，谁也没觉得吃家家户户“集约化”吃红薯叶子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。也许真的是三十年河东，四十年河西吧，若干年后，红薯叶子登堂入室，亮相各大超市生鲜柜台，摇身一变，有了个很洋气的名字：叶丽青。当同事刘小兰怂恿我到长在校园一隅的红薯地里掐红薯叶时，那个洋气的名儿一时间竟让我满头雾水。那十几棵红薯，长在角落里的垃圾堆里，不知是谁家种下的，抑或根本没有主人。它们的长势非常好，叶子很茂密，隔三差五总可以采下一把，做道蒜米红椒炒红薯叶柄。后来有一次应邀去朋友家吃饭，朋友故作神秘，席间吊足了胃口，才上来一道绿得滴油的素炒青菜——连藤带叶，好像红薯藤的嫩尖，竟有别样风味。一打听，孤陋寡闻的我才知道有专门长叶子供采食的红薯品种，藤蔓下面不结红薯，藤蔓叶也不像结红薯的品种那样尽情往远处长，而是围着根一丛一丛地往外冒，都是嫩尖，可以一茬接一茬采收。再回来时，我也在花盆里种下了几棵，用淘米水浇灌，每每将嫩尖给掐了炒菜。做法精致的炒红薯叶，不再是记忆中带着青草味的粗鄙模样。